

财金视角

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 释放经济澎湃动力

孟珂

近日,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《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》(以下简称《方案》),提出两个阶段的主要目标:到2027年,消费品供给结构明显优化,形成3个万亿级消费领域和10个千亿级消费热点,打造一批富有文化内涵、享誉全球的高品质消费品;到2030年,供给与消费良性互动、相互促进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基本形成,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步提升。

供给与需求,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。当前,我国消费市场呈现升级加速、分层加快的态势:一方面,居民消费呈现个性化、品质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的多样化需求;另一方面,部分行业

“内卷式”竞争加剧,同质化、低端化供给过剩,好产品“买不到”的结构性矛盾凸显。《方案》紧扣供需适配这一“牛鼻子”,既给规模增量“定目标”,又给结构升级“指方向”。

聚焦一老一小,让民生痛点变成增长点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,截至2024年底,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3.1亿,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比上年增加52万人,这两大群体对应的是“银发经济”、儿童用品消费的广阔蓝海。《方案》将老年用品、婴童用品分别纳入“三个万亿级”“十个千亿级”,就是要用系统化、标准化、智能化的产品供给,解决当下民生痛点。

突出数智融合,培育新质生产力。智能网

联汽车、消费电子、智能穿戴产品、民用无人机……《方案》列出的重点领域,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。近年来,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,数字消费、绿色消费快速壮大,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力。

厚植文化基因,让国潮崛起激活消费自信。《方案》将潮玩、珠宝首饰、国潮服饰纳入千亿级目录,引导企业把东方美学、非遗技艺转化为商品标准与消费场景,推动文化元素从营销符号升级为产品内核,让国潮从“网红”变“长红”,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动力,让文化自信转化为发展动能。

毫无疑问,2027年时,万亿级、千亿级绝

不仅仅是统计数字,更是中国经济的澎湃动力。



孟珂

国资央企向“新”并购的三重逻辑

杜雨萌

日前,国务院国资委组织召开中央企业专业化整合推进会,会上,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、副主任李强强调“国资央企要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整合能力”,同时提出“要多用、善用资本市场”。

“多用”反映的是使用频率和广度的提升,“善用”则强调使用的质量与效率。从“借助资本市场”到“多用、善用资本市场”,凸显了资本市场在当前国资央企并购重组中的核心支撑地位,更充分说明,在央企控股上市公司“提质”行动持续深化背景下,国资央企或已初尝市值管理“甜头儿”。在笔者看来,当前,国资央企坚定不移向“新”并购,蕴含三重深层发展逻辑。

宏观层面,这是锚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战略使命。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“压舱石”,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国有资产安全,更承载着服务国家战略、稳固经济大盘的重任。目前,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已突破90万亿元,利润总额超2.6万亿元,且在钢铁、船舶、能源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,但不得不承认,其也面临多重现实挑战:一方面,国内传统产业供需错配、同质化竞争加剧,部分行业利润收窄、增长动能减弱,传统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;另一方面,在国际竞争中,部分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。面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,中央企业必须跳出传统路径依赖,聚焦科技含量高、溢出效应强、增长潜力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,通过创新驱动破解技术瓶颈,推动国有资本向产业链高端、关键核心领域集中,这既破解“卡脖子”风险,也筑牢企业长远增值根基。

中观层面,这有助于打通“科技—资本—产业”的正向循环生态。国资央企向“新”转型的关键价值,在于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瓶颈,构建三者深度融合的良性循环。在这一循环中,中央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,攻克关键领域核心技术,形成可产业化的科技成果;资本市场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的激励机制,为其提供从风险投资到上市融资、并购重组的全链条、接力式服务,为技术落地和产业扩张提供“耐心资本”;随后成熟的产业运营为资本带来稳定回报,反哺研发再投入。这种“科技突破—资本赋能—产业升级”的良性循环,既激活了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,又优化了国有资本配置效率,让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,让资本更精准地流向高价值领域,进而形成三者相互促进、螺旋上升的生态格局。

微观层面,这旨在打造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“第二增长曲线”。价值创造是中央企业价值经营、价值实现的核心前提,更是市值管理的根本支撑。长期以来,部分中央企业依赖传统主业形成路径依赖,在市场环境波动、行业周期调整中,不可避免地面临增长乏力、盈利韧性不足、市场估值承压等问题,制约了国有资产市场化增值和市值管理有效性。当下,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整合能力将为中央企业开辟“第二增长曲线”、破解市值管理瓶颈提供历史机遇。通过快速并购切入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赛道,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进一步转向以技术壁垒、品牌优势为核心的“智慧型增长”,向资本市场提供企业可持续价值增值预期,进而从根本上改善估值逻辑。通过培育“第二增长曲线”,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既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转换,更以持续稳定的价值创造,推动其市值管理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、相互促进。

综上,国资央企向“新”并购,是宏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、中观产业生态构建、微观企业动能激活的同频共振,三重逻辑层层递进、相互支撑。随着更多中央企业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整合为抓手,以价值创造为核心,国有资本将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中实现价值重估,为资本市场注入持久稳定的“央企力量”。

AI与储能“双向奔赴”如何重构投资价值

李春莲

随着人工智能(AI)算力需求的爆发,原本受关注较少的储能产业,正因能解决AI运行所遇到的电力供应瓶颈,变为AI时代不可或缺的核心动力。

近日,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·纳德拉提出,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已不是芯片供应,而是电力短缺。

在笔者看来,储能成为AI竞赛的新方向,是产业需求、市场周期和技术融合三重逻辑共同驱动的结果。

第一,储能成为破解供电瓶颈的关键。

曾经,储能只是新能源版图中的一环。如今,它已成为连接AI与能源的关键桥梁。储能不再仅仅是解决弃风弃光问题的工具,更是稳定电网、保障AI电力供应的核心。

AI算力的指数级增长,与全球电力供应体系存在矛盾。AI数据中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“超级耗电大户”,其电力需求远超传统数据中心。然而,电网建设周期长、流程复杂,难以跟

上AI算力设施的扩张速度。

从自身特性来看,储能就像是电力系统的“缓冲器”。在用电低谷时,它可以储存多余的电能;在用电高峰或者电力供应不稳定时,再将储存的电能释放出来,保障电力的稳定供应。这一特性对于电力需求波动大的数据中心来说至关重要。

第二,AI重构储能投资价值。

2025年,中国储能行业迎来关键转折。随着峰谷价差套利、辅助服务等市场化盈利模式逐步清晰,行业从“政策驱动”转向“市场自发”,招标量与装机量持续增长。截至2025年9月底,中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已突破1亿千瓦,占全球总装机比例超40%,稳居世界第一。

AI技术的迅猛发展,为储能产业链带来了全新的投资逻辑与增长机遇。例如,在生产端,智能制造正重塑动力电池材料

研发及电芯制造、系统集成的成本结构;而在应用端,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爆发,特别是AI对电力的渴求,大幅提升了储能的市场想象空间。

第三,AI与储能技术实现双向赋能。

AI与储能的融合,是一场技术与产业的双向奔赴。AI技术的成熟,为储能产业的效率提升、成本降低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。换言之,储能不仅是AI产业的“电力后盾”,更成为AI技术应用领域的“新战场”。

可以预见,未来的AI竞赛,不仅仅取决于算力、算法,还在于能否提供充足、稳定的电力支撑。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和成本持续降低,储能必将在AI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,助力AI产业迈向新的高度,而这也将深刻改变能源格局。

审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能有助于提升治理效力

邢萌

近日,东北证券、中航基金、山东国信等金融机构相继宣布撤销监事会。事实上,今年以来,“监事会退场”现象涉及银行、保险、券商、基金、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,引发市场持续关注。

金融机构设立监事会,旨在通过财务监督与履职监督,防范权力滥用。在特定发展阶段,这确实填补了金融机构内部监督的空缺,但实践中,一些监事会暴露出“独立性不强、专业性不足、权威性有限”等问题,导致监督流于形式,难触及实质,以至于逐步被边缘化。

金融机构撤销监事会后,内部监督由谁接棒?根据相关法规,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将承接监事会职权。这非但不是对监督权的削弱,反而是显著加强:监督权被嵌入决策核心,推动机构治理从形式上的“权力分立”迈向实质上的“功能融合”。这一转变,成为观察中国特色金融治理体系演进的重要窗口。

此次金融机构内部治理转型,源于2024年7月份正式施行的新公司法。新公司法明确规定,公司可选择由董事会下的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

权,不再强制要求设立监事会,为治理架构优化提供了根本法律遵循。在此框架下,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、证监会相继出台配套政策,支持金融机构选择审计委员会作为内部监督主体。

审计委员会取代监事会,还有利于解决旧有治理模式下的监督职能重叠问题。过去,二者在财务监督、内部控制、风险管控等方面职能高度交叉,导致权责不清、资源内耗,既推高了治理成本,也削弱了监督实效与决策效率。

从现实情况看,这一替代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。具体而言:在人员构成上,监事会常因内部人员主导而独立性不足,审计委员会则多由具备财会、风控背景的独立董事构成,专业性与独立性更强;在组织结构上,监事会因与董事会平行而处于决策流程之外,监督易流于表面,审计委员会则内嵌于董事会,能提前介入重大决策审议,从源头强化风险控制;在监督效能上,监事会多从事事后程序性检查,难以干预决策实质,审计委员会则能依托专业与信息优势,实现对财务、内控与风险的“穿透式监督”,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预警与事中控制。

事实上,不少金融机构的审计委员会已成为实质履行监督职能的部门,这也成为此次制度变革顺利推进的现实基础。然而,新结构也面临新挑战,作为董事会下设部门,审计委员会在监督管理层的同时也须监督董事会,如何确保其履职尽责,仍是金融机构提升内部治理的课题之一。

